

文化改革首入考核,指挥棒“棒”指何方?

——代表委员呼吁改变文化畸形发展现状

据新华社电 政府工作报告首次提出,把文化改革发展“列入各级政府效能和领导干部政绩考核体系”,引发部分代表委员对新一轮文化项目“大干快上”的担忧:文化创意园“有园无戏”,没有创意产品,不能吸引受众,反倒是地产开发红红火火。

一些代表委员呼吁,提升“软实力”要遵循文化规律,发挥指挥棒的科学引领作用,以强盛文化加快实现“中国梦”!

园区遍地开花,挂“文化”之名行“地产”之实

借着文化大发展的“东风”,各地文化项目、文化园区开始“遍地开花”。一项统计显示,目前全国大大小小的文化产业园超过万家,仅北京、上海、广州等10个城市,四五年间就建了300多个,乃至一些区县、乡镇也纷纷开建文化产业园。

“文化园里什么企业都有,同质化倾向严重。”全国政协委员高抒调研中发现,一些文化园区“挂羊头卖狗肉”,名为发展文化创意产业,实际上多为商业办公、休闲娱乐,靠地产开发,收取租金盈利。

在全国人大代表朱瑞莲看来,由于特色不鲜明、规划不合理等原因,一批“投资大、占地多、名头响”的文化项目和产业园市场惨淡,有的“还未建好,已经夭折”。

2012年5月,耗资5000万元、被称作“全

国最大古戏楼”的谭鑫培戏楼被曝演出成本高昂,一直处于“有园无戏”状态。宜昌“中国三峡·非物质文化遗产博览园”历经5年工期,最终不了了之。

在国家调控房地产的大背景下,越来越多的“文化”主题公园开建。有的投资上百亿元的电影主题公园,计划建设面积比香港迪士尼乐园大几倍,由于占地多、分阶段开发,被网民质疑是“赤裸裸的房地产开发”。

一些城市热衷搞造型怪异的文化地标,反而成为“另类”。“我们太急了,以为有了文化公园、文化地标,就有了文化。其实不然。”全国人大代表、中国美院院长许江认为,文化创新“在质不在量”,核心在于思想、内涵和品质。

量多竞争力弱,中国“故事”如何向世界表达?

《国家“十二五”时期文化改革发展规划纲要》提出,文化产业发展的关键在于构建现代文化产业体系,培育现代文化市场,鼓励文化企业走出去。

一些代表委员说,2009年国家把文化上升为“战略性新兴产业”以来,培育出了方特主题公园、丽水金沙等一批文化品牌。但是,受急功近利、粗放发展等因素影响,部分文化产业出现的畸形发展必须警惕。

“大而不强、输出困难。”我国文化产业的现状引发代表委员关注。中国GDP跃居世界

第二,但文化产业占比不足4%,远低于发达国家平均10%、美国25%的比例。中国每年拍摄600多部国产电影,七成没有机会上映。2012年全国票房排名前十名的电影中,华语电影只占三席。

事实上,相对于群众的文化需求,中国的文化产品总量并不少。全国人大代表、海南大学校长李建保分析,目前国内文化市场存在着结构性错位:一边是文化产品质量不高,市场呈现“供大于求”;一边是老百姓找不到好的文化作品,文化需求“吃不饱”。

“各地发展文化的热情可以理解,但文化竞争力不能靠上项目、拼数量。”全国人大代表、中国著名女高音歌唱家吴碧霞曾多次赴海外开展文化交流,深感中国文化影响力还不够大。“中国要重塑文化内核,不仅满足13亿人日益增长的文化需求,更要走向世界。”

“目前缺乏一种途径和桥梁来讲述中国故事,传递中国文化。桥梁的关键在人。”全国人大代表、苏州昆剧院副院长王芳注意到一个有趣现象:欧美很多博物馆的解说员虽然年龄偏大,但文化历史知识渊博;国内的解说员大都年轻漂亮,但往往照本宣科。“文化生产者、传播者的素质,决定了文化产品的质量和影响力。”

高抒委员认为,一些收视率、票房好的影视作品,缺乏文化内涵,难以给人积极的、向上的力量。“一个国家需要每年都有几个叫好又叫座的文化大餐,传递主流价值观念,凝聚社会精气神!”

文化难量化,指挥棒如何科学指挥?

盛世崛起,离不开文化复兴。一些代表委员认为,把文化纳入干部考核,一方面能提高地方政府对文化的重视,加大对文化产业的投入。另一方面,也需警惕片面追求经济效益的倾向,按照文化发展的规律,发挥指挥棒的正面引导作用。

“政府管文化,既不能越位也不能缺位。”许飞代表说,发展文化不能只抓那些看得见的东西,比如建场馆、添设施、搞项目等。对于文化来说,硬件虽然重要,但核心是人,是创意,是作品。“指挥棒应该向这三个文化要素倾斜。”

王芳代表认为,各地发展文化产业,关键是挖掘好当地特色文化,找准群众的需求点。以苏州名人、博物、美术、文化“四大新馆”为例,由于特色突出、错位竞争,每年文化展演展示超过3万场,吸引观众3400万人次。

繁荣文化市场要打破城乡壁垒,畅通文化传播渠道。全国政协委员连介德说,对于广大农村偏远地区来说,首要问题是解决广大农民最基本的文化生活需求。“考核地方政府文化投入,关键看是否向农村和基层倾斜。”

“文化是民族的血脉,是人民的精神家园。”全国人大代表、巴彦淖尔市民族歌舞剧院副院长姜兰表示,文化改革首次纳入政府考核,不能片面侧重设施、设备等硬件,更要关注人员、创意、营销等软件。

“三岁看到老” 诚信需要从娃娃抓起

——代表热议“诚信建设”

据新华社电 “在社会矛盾增多的大背景下,应从国家层面对诚信体系建设作出部署,诚信需要从娃娃抓起。”出席十二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的部分代表纷纷建议,诚信建设也应有顶层设计,用政务诚信带动商务诚信和社会诚信。

“政府一直努力做到诚信,但有时会出现承诺没有完全兑现的现象。”全国人大代表、浙江省景宁畲族自治县县长蓝伶俐认为,这是因为政府多半给自己定的目标比实际要高,这也是自我加压,从而努力兑现承诺。

全国人大代表、绍兴文理学院院长叶飞帆说,打铁还需自身硬。政府和官员要带头做好表率,将有利于整个诚信体系的建设。

近年来,制假售假、食品药品安全等方面问题层出不穷。全国人大代表、浙江省人民检察院检察长陈云龙表示,主要原因是有些企业不讲诚信,这也“说明食品安全问题已经非常严峻

了,因此商务诚信必须同样引起高度重视”。

“商务失信频频发生的根源在于,一些商务经营主体唯利是图。”全国人大代表、祐康食品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戴天荣说,企业如果离开诚信,百年企业就无从谈起。

全国人大代表、浙江省国际贸易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王挺革说:“民间有语‘三岁看到老’,我感觉不无道理。一些诚信较好的发达国家,诚信教育都是从小抓起的。”

叶飞帆赞同这一观点。他认为,推动诚信体系建设,需要从娃娃抓起,让孩子从小就懂得诚信。推进诚信体系建设,还要从小事抓起,从身边的一点一滴做起,形成诚信的正能量。

一些代表表示,推进诚信体系建设,还要从净化社会的大环境抓起。诚信体系建设并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情,需要一个漫长的过程,需要持之以恒加以推进。

贩卖病死猪吃死人才立案?

代表建议食品安全立案不能用涉案金额衡量

据新华社电 “贩卖病死猪、注水猪非常猖獗,但屡禁不止。究其原因,法律标准过低致贩卖病死猪、注水猪在绝大多数情况下构不成犯罪,检察院都不予受理。”全国人大代表、保定市副市长闫立英说。

“根据食品安全法,判定生产销售不安全食品罪,需要两个条件:一是违法涉案金额达5万元,二是要对人民生命健康造成严重损害。”闫立英说:“病死猪一头才二三百元,要达到5万元的案值,这得多少病死猪啊?”

“我们很多次行动,都有公安介入,人赃俱获,还都有检验报告。但是交到检察院要起诉时,检察院说我们没法起诉,有的是因为案值不够,有的是因为没有造成严重后果,就是说没有吃死人。检察院不接,就打回公安局,公安

局就交回食品监管部门,说你们处罚得了。”闫立英说。

闫立英说:“当前行政处罚只是一罚了之,罚了他几万元钱,增加了他的成本,他反而变本加厉,知道你抓住他也不能把他怎么样。但是事实很清楚啊,非要等吃死人了,法律才能管他啊!”

全国人大代表、廊坊市政协副主席王学求建议,食品安全案件的立案不能按价格衡量,只要制假售假就应严格处置,“毕竟一头病死猪被贩卖到市场上,就有可能伤害很多群众的健康,这一块的执法和立法必须严苛和科学。”

闫立英建议,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成立以后,要抓紧调整修改完善食品安全法,健全法律体系,提高违法成本,加大打击力度。



3月12日,全国政协十二届一次会议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闭幕大会。这是记者在闭幕会前抓紧时间采访。
新华社发

“必须把收费权力关进制度笼子!”

据新华社电 “目前,全国有多少收费项目?收费总额是多少?收费主体是谁?收费用途是什么?国家一直在整顿乱收费,但乱收费现象并未根本改观,必须把收费权力关进制度笼子。”——全国政协委员、民建中央副主席周汉民。

“对于机构改革,我完全赞同。但我担心,机构改革前定下的项目会不会因为‘机构改革没人拍板’而搁置?”——全国人大代表、甘肃省省长助理、庆阳市委书记夏红民。

“你现在去书店里看看,最畅销的书是什么?无非是描写情战、官战、商战的,讲的都是如何勾心斗角,宣扬的是人性中最黑暗的一面。为了赚钱,一味迎合而不是引导社会趣味。”——全国人大代表、藏族作家阿来。

“改革呼声和氛围从未如此强烈。只有紧紧抓住、用好这一改革攻坚的‘时间窗口’,才能掌握改革和发展的主动权。”——

全国政协委员、中国(海南)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迟福林。

“目前一些企业为减轻人员包袱,随意放宽内退年龄搞‘一刀切’。这导致很多‘被内退’职工要求重新上岗或给予经济补偿。要责成各地清理旧的、杜绝新的违规行为,责成企业对‘被内退’职工安排重新上岗或给予一定经济补偿。”——全国人大代表龚曙光。

“中国网民现在的上网资费过高,一个原因是互联网宽带的基础设施交由运营商承担,电、光纤、设备等昂贵的费用最终分摊给老百姓。与国外相比,我们的收入本来就低于别人,但是资费贵过别人几倍、十倍。”——全国人大代表马化腾。

“目前,在查处职务犯罪的过程中,量刑以及从轻处罚上的标准比较模糊,同案不同判的现象普遍存在,轻刑化的倾向十分明显,损害了法律的统一和尊严。”——全国人大代表、安徽省检察院检察长薛江武。